朱熹《诗集传》在明代的衍生及其学术意义

周　荣

内容摘要：朱熹《诗集传》在明代的衍生著作大体有四种类型。其中删节本以删削朱注为主要编纂方式，取便初学是其重要考量；删选本取舍篇目、章句的原则，兼顾了科考的出题偏重和诗篇的辞章性；增注本摭拾众说，或辅翼、或辩证朱《传》，客观上推动朱子《诗》学的扩容与突破；拼合本对朱《传》进行二次改造，组合各类《诗》说文本以提供更为丰赡的经学知识和应试指导。明人不断增、删朱《传》的文本内容，又热衷于变换其外在形式，主要目的是服务于科举制度下的广大学《诗》阶层。朱《传》从宋到明的衍变轨迹，折射出近世《诗》学教育普及化的历史进程，亦反映出与之相关的科举教习、书籍流转及商业出版等复杂历史情境。

关键词：《诗集传》　衍生文献　明代《诗经》学　宋明书籍史

关于朱熹《诗集传》（本文简称“朱《传》”）文献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版本比较、成书过程等方面①，可见学界更关注朱《传》文献之“前史”，对其“后传”——即它在后世的再生产实践，目前研究尚少②。其实，朱《传》在南宋的编纂与刊布仅是其流播之嚆矢，它在书斋和书坊中几百年

①关于朱《传》文献学研究的代表作有：束景南：《朱熹作〈诗集解〉与〈诗集传〉考》，《朱熹佚文辑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60—674页；朱杰人：《论八卷本〈诗集传〉非朱子原帙兼论〈诗集传〉之版本——与左松超先生商榷》，《中华文史论丛》第五十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12—240页；牟玉亭：《〈诗集传〉的三种版本》，《诗经研究丛刊》第二辑，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188—197页；包丽虹：《朱熹〈诗集传〉文献学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束景南指导），2004年。

②有少数学者关注到朱《传》在后世的流变情况，如顾永新：《〈诗集传〉音释本考》，《文献》2012年第4期，第3—17页；付佳：《朱熹〈诗集传〉刊刻与流传新探——以二十卷本系统为研究对象》，《文学遗产》2019年第2期，第71—81页。

的阅读、使用历程更为丰富多彩。

朱《传》在明代被悬为功令,官方与民间刊刻甚夥①。明刊本大体可分为二十卷本和八卷本两大系统,其版本价值历来评价不高。本文的关注视角偏向于民间和基层,主要考察编刊于明代的朱《传》衍生著作,特别是当时盛行的各类坊刊文献。

所谓朱《传》衍生著作,即在学术思想或文献形态方面与朱子原书产生关联的著作,可分为两大类:广义的衍生本是指与朱《传》进行学术对话的一切《诗》学著作,它们或遵从、或背离朱子《诗》学立场,撰述体式多样化,包括经注、札记、讲章、类书等形式;狭义的衍生本则要求以朱《传》为基本框架,全部或部分保留其文本要素。为使研究对象不失于泛滥,同时便于从书籍形制的特定角度展开考察,本文取狭义的衍生本概念。

明代朱《传》的衍生本是以朱《传》为基础文本材料,对其经文、注文或体式等进行删减、增补或改造,但大多并不背离朱子《诗》学原旨。诸作多为服务于科举或训蒙的教习读本,可分为删节本、删选本、增注本及拼合本四种类型,具有书籍种类丰富、学阶层次分明和编纂形式多样的文献衍生态势。今存明代朱《传》衍生书籍(除白文本外)有 50 余种,作为占据一定数量比例的《诗》学文献类型,其存在及价值自不可忽视:它们不仅是朱《传》文献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亦储存着丰富的学术信息和历史记忆。但以往由精英和经典建构的正统话语造成了一定的研究盲区,导致这些曾在当时大众社会中产生过相当影响的普及性《诗》学书籍常被忽略。故对这一文献群体做动态化考察,厘清其文献体系,不仅有利于转变研究范式,亦能深入洞悉更为真实复杂的历史情境和近世《诗》学嬗变的路径。

一、删节本:取便初学的考量

删节本系通过节略朱《传》文本而成的新著,其体量通常远小于原书。这类书一般隶属于“五经总义”丛书,其编者通常认为注文具有拘束思想、割裂经文或滞碍训蒙等弊端,故诸书以大量删削朱注为主要编刊方式,既体现“尊经”意识,亦为初学启蒙提供便利。除普通的删注、删改本外,另有白文和旁训两类较为特殊的删节本常被忽视,本节亦做详探。

---

①有学者统计,朱《传》在明代至少有 26 种刊本。详参杨晋龙:《明代诗经学研究》,台湾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张以仁、吴宏一指导),1997 年,第 224 页。

(一)一般删注本、删改本

单纯删削注文的一般删注本在明代较为常见,比较典型者如武林花屿本《诗经约注》,是书以明刊八卷本《诗集传》为删削底本,仅保留朱子的“赋比兴”标识、诗柄及少量注文等核心内容。又如二乙堂夏璋所刻《诗经纂注》,亦是删除八卷本的字词训释及朱注拓展引用部分,所保留者多为串讲诗意的注文,体现出夏氏注重贯通大意、不为繁琐训诂的编辑思想。这类书对经典持有敬畏之心,一般不轻易删动《诗》原文,认为“五经为至圣所定,而轻加删削,恐非自量,且不成完书”①。但它们又秉持“经综其全而注从其约”的理念,大量删裁后人繁琐注疏,目的是使全书简明精约、展卷了然,便于初学观览,以达到“用力易而收功博”的效果②。

此外,又有一种删改本,在大量“删”的同时亦有少量“改”和“补”,不仅具有上述二书取便初学的功用,亦展现出一定的学术思索。以杨寿隆《诗经集注删补》为例,是书于朱《传》并非全盘接受,从书前所增附的杨守陈《诗私抄叙》即可窥见其学术旨趣。杨守陈本系明代较早质疑程朱经传和倡言心性的学者,其文对朱《传》“淫诗说”亦批评颇多。杨寿隆书以朱《传》为底本,但不附音释,且大幅删削注文。而细读其所保留的朱注,亦时见细微改动处,主要有五种情况:一是订朱注自相矛盾者,如《汝坟》朱子诗柄云“妇人喜其君子行役而归”③,末章却借妇人之口埋怨王政“酷烈”,杨氏认为朱注前后矛盾,故改用语气更为舒和的表述④;二是改朱注与经文背离者,如杨氏认为《北山》前两章注文与经文相背,遂改注中“皆”为“乃”、“王”为“大夫”⑤;三是疏通上下章节注文,其目的是便于八股行文,如杨氏认为朱注并未顾及《车舝》三四章语脉的贯通,故于第四章改注云“承上章而言,汝苟不尽情以相乐,然令德来教,遇此非常之人,我心则无遗恨矣”⑥;四是删补注文迂缓者,如杨氏将《渭阳》

---

①夏璋编:《五经纂注》卷首识语,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二乙堂刊本(索书号:rb0976),书名叶。

②汪裕:《五经约注序》,李廷机纂注:《五经约注》卷首,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武林花屿刻本(索书号:S 愚 经 472),叶二。

③朱熹集撰,赵长征点校:《诗集传》卷一,中华书局,2017 年,第 10 页。

④杨寿隆编:《诗经集注删补》卷一,日本内阁文库藏明末刊本(索书号:273-0201),叶六。

⑤杨寿隆编:《诗经集注删补》卷二,叶五十至五十一。

⑥杨寿隆编:《诗经集注删补》卷二,叶六十三。

第二章及篇末大量史实引文尽悉删除,另补“琼”“瑰”等字的解释和其他语句串讲①;五是将朱注中所涉宋朝地名,均据《大明一统志》重新裁定。但总体而言,此书核心论说悉归朱子旨意,杨氏自言“不敢为紫阳罪人”,目的仅是使朱《传》“易者略之”而“难者详之”②,其性质实为助益童蒙的教学读本。

(二)白文本、准白文本

白文又称正文,原则上为不掺杂任何注释的经书原文。林庆彰指出明末清初曾兴起一场“回归原典”的学术运动,即经学研究者开展“正经”工作,致力于恢复经书原貌、探求孔孟本旨③。其实这种重视原经原典、警惕因注迷经的意识,在明中期教习阅读和书籍刊刻领域已初露端倪。阳明心学的盛行、程朱思想的制度化钳制以及经学传注的日益繁复琐碎等诸多因素,共同引发明中后期学人不假注疏、直接圣贤的思考与实践。他们认为圣人妙义不在注疏,过度依赖宋人传注反而导致自我沉潜体验功夫的缺失,故提倡先烂熟经书白文、再徐求注疏的读书程序。如何良俊自述幼时读经为传注缠绕,无暇寻绎本文,直到“将白文细细思索,颇能得其一二,乃知传注害人亦自不少”④。尊奉心学者亦反思传统注疏支离破碎之弊,认为其致使学者拘于沿习而不能自发义旨,无异于画地为牢,故推崇批玩研讨白文之法,倡言“以吾心为注释”⑤。具体到《诗经》学领域,明人亦强调深度讽咏《诗》白文的重要性,如陈组绶指出:“试将本文玩诵数周,勿为先入之见,则全诗血脉,宛宛呈露,去寻行数墨者天渊矣。”⑥在此风气下,《诗经》白文类书籍因阅读群体的扩大得以大量生产。

朱熹为恢复《诗经》“古本”原貌,建立自己的《诗》学体系,曾对汉唐

---

①杨寿隆编:《诗经集注删补》卷一,叶七十二。

②杨寿隆编:《诗经集注删补》卷首《删补凡例》,叶一。

③林庆彰:《明末清初经学研究的回归原典运动》,《明代经学研究论集》,文史哲出版社,1994 年,第 333—360 页。

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四《经四》,《续修四库全书》第 1125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544 页。

⑤许国撰,叶向高等辑:《许文穆公集》卷二《五经正文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40 册,北京出版社,1998 年,第 374 页。

⑥陈组绶纂:《诗经副墨》卷首《凡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 71 册,齐鲁书社,1997 年,第 6 页。

以降传继的《毛诗》文本重新校勘文字、分章断句和调整篇次①。今见明代《诗经》白文本在分章、篇次等方面多与朱子保持一致,而非同汉唐注疏本,可见其底本当为朱《传》。如嘉靖六年(1527)陈凤梧刊本、广阳陈儒刊本等,即为典型代表。

此外,尚有在白文基础上保存少量朱《传》要素的“准白文本”,其书名虽冠以“白文”或“正文”字样,但并非纯粹的白文,相关书籍见表1:

表1

编刊(或校订)者及书名	刊刻(或作序)时间	朱序	赋比兴标注	诗柄	音释
衡藩《诗经》(五经本)	嘉靖十九年	无	无	无	同明刊二十卷本
翁溥《诗经正文》(五经本)	嘉靖三十一年	存	无	无	与明刊八卷本接近
李登《诗经正文》(五经本)	万历二十四年	无	无	无	同翁溥本
张斐《新刻占魁高头提章诗经正文》	万历四十年	无	存	存	无
秦镤《诗经正文》(九经本)	崇祯十三年	存	无	无	节自明刊二十卷本
会通馆《详增经旨音释毛诗白文》	明刻	存	无	存	来源不详
佚名《诗经白文》(五经本)	明刻	存	无	存	无

表1所列诸书虽均未收录大段朱注,但它们不仅采用了朱子所裁定的《诗经》文本,还或多或少存留着朱序、赋比兴标注、诗柄、音释等内容,实可视作“极简本”《诗集传》。诸书注音多吸收明代流行的八卷本或二十卷本,而卷次或囿于丛书体例不分卷,或径直分为“国风”“小雅”“大雅”“三颂”四卷,进一步丰富了朱《传》卷次分帙情况。

与精英学者从学理上阐述白文类文献之重要性不同,书籍编刊者虽也不乏担忧训诂繁多而遮蔽经旨抉发的学术关怀,但他们更强调诸文献众多的实用优势,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种:一是各类注疏本卷帙浩繁,购之不易,白文本殊便观览;二是刻入群经总义丛书之中,颇能博通载籍,便于广采;三是白文本校考无讹,舛误更少,刊印精良。

(三)旁训本

从文献衍生的角度来看,明代诸《诗经旁训》均系删减朱《传》注文,保留原书篇次章句、序文、诗柄等核心要素,变换其体式而来。明代流行

①陈才:《朱子诗经学考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65—225页。

的旁训本《诗经》文献主要有朱升和李恕两大系统。台北故宫博物院存有两本《诗经旁注》,一为明刊梵夹本,一为陈大科刊本,馆藏均著录为“明朱升撰”,然文献本身并未提供任何编撰者线索,实不知其所据,甚为可疑。而与元人李恕相关的明刊《诗经旁训》文献今存至少有 10 种,后人将署名权归于李恕,主要依据或是陈文烛的刻书序文①,但杨士奇早已明言李恕原书传至明初已有阙误②,顾永新亦认为“明代汇刻的《五经旁训》中之《诗经旁训》并非李恕原本”③,故陈氏所言文献来源未必可信。但可以推测,明人诸刻本继承着李恕原书“旁训”的体式和某些内容要素,同时也有独创之处与改造之功。若不再纠缠于原始撰者,而是把目光移回文献本身进行比勘校核,更加关注相关文献在明代的翻新与改造,则能理出更为清晰的源流关系。以诸书随文音释的差异作为切入口,可大体确定它们所参用的朱《传》底本为何,从而划分出二十卷本和八卷本两大系统;而比对它们裁剪原书的细微差异,则能进一步厘清各书之间的渊源。

在二十卷本系统中,年代较早者为朱鸿谟于万历十六年(1588)巡抚江西时组织刊刻的《五经旁注》,此书前附李恕赞文、杨士奇跋语及马砺识语,其《诗经》册音释整体上采自二十卷本,仅少量与八卷本相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明刊梵夹本虽未存李恕诸人序文,但正文内容与朱刊本完全一样。又有台湾汉学研究中心所存十七卷本《五经旁训》(简称“台图本”),其《周易》册首残存李恕、杨士奇及马砺等人文字,《诗经》册音释亦与朱刊本相同,但注文略有删补。要之,上述三书注文及所附序跋、题识等情况相似,特别是注音多用反切法,均与二十卷本更为接近。

八卷本系统诸本注音多用直音法,显系吸收明刊八卷本朱《传》的音释成果。现存较早者为郑汝璧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巡抚山东时所刊,此书影响甚大,杭州书林徐龙峰、金阊拥万堂及金阊鲁邹岳梓行本均保留着郑氏原书《刻五经旁训引》一文,以上诸本《诗经》册正文所存留的朱

---

①陈文烛:《五经旁训序》,李恕:《五经旁训》卷首,《故宫珍本丛刊》第 17 册,海南出版社,2000 年,第 1—2 页。

②杨士奇:《东里续集》卷十六《五经旁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38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582 页。

③顾永新:《经学文献的衍生和通俗化——以近古时代的传刻为中心》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487 页。

《传》内容及出注位置亦与郑刻本相同,有明显的承袭关系。多伦多大学图书馆藏崇祯二年(1629)陈仁锡序刊本,除书名为“诗经旁注”而非“旁训”外,其余各方面与金阊书林二本几乎完全一致。至于陈大科刊本,陈氏序提及其重刻底本由周应治从山东携来,而周氏曾负责郑刊本的校雠工作①,再结合正文内容之比勘,可知此本亦当来自郑刊本。除围绕郑刊本翻刻的诸本外,此系统另有王安舜天启元年(1621)刊本,经王氏删定后,注释较郑本更为简洁;又有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武林藜照阁梓行的《五经旁训》,与《忠经》《孝经》合编,题高其昌删定,其《诗经》册出注位置及注文繁简与上述诸书均有较大差异。

据上,诸文献关系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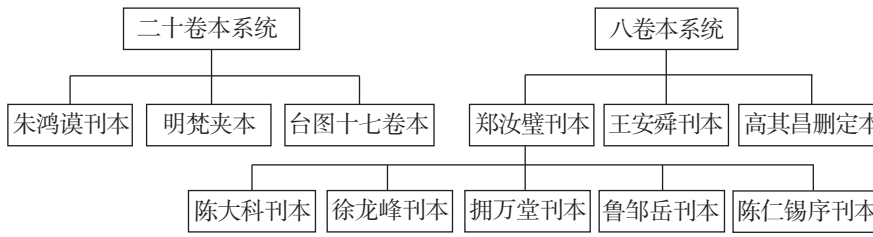


图 1　现存由朱《传》衍生而来的明代“旁训”类文献关系图

与一般《诗经》注本将注文缀接于经文之后不同,旁训本将所裁取的字词训释以小字形式书于经文之旁,具有删繁就简、窄行旁注和依经直解的特色。如《关雎》首章,朱《传》释“洲”为“水中可居之地也”②,旁训本则仅于“洲”字旁注“水中地”三小字(见封二图 1③),其减省之法类此。诸人刻书序跋业已明言,这种改造为的是便于初学理解与诵读:注文之精简能避免古注本繁冗之弊,达到词约旨明、批卷了然的效果;旁训体“离而观之则逐字为训,合而诵之则文义成章,纲提目举,一览可知”④,故体式之变换能起到提醒重点内容、连贯融通经文和便于诵读翻检的作用。

①详参顾永新:《经学文献的衍生和通俗化——以近古时代的传刻为中心》上册,第 480 页。

②朱熹集撰,赵长征点校:《诗集传》卷一,第 2 页。

③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天启元年(1621)王安舜刊本《五经旁训》(索书号:T/110/1132),叶一。

④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七六《朱学士升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376 册,第 269 页。

值得注意的是,《诗经旁训》在教习场域中常被视为“入道之径”或“经学指南”,随着经学教育的普及和阅读市场的开拓,官刻本之外又出现大量坊刻本,具有明显的商业化趋向。

二、删选本:科考与辞章的兼顾

所谓“删选本”,指不仅对朱《传》注文有所删节,亦会按照一定标准对《诗经》之篇目、章句进行筛选取舍的一类文本,类似于集部之选本。现存明代朱《传》删选本约 8 种,其中个别著作虽有增注情况,但诸作区别于他书的独特之处仍在于“选”,书名所冠“选注”“摘草”“粹抄”等即是体现。选《诗》现象的风行,与《诗经》在明代的普及性演进密切相关。随着识字人口的增长,明中后期应试人数空前增长,考试难度亦持续增加,这使得研修《诗经》成为一种更具功利性的活动,《诗》由圣人经典跌落为名利津梁,学《诗》也由学人的严肃注疏下移为学子的日常读写。另一方面,“六经皆文”一语由明人正式提出①,《诗经》与后世诗文同为“文”的观念广泛实践于明人的文学活动中。各类诗话对《诗经》的文学性评论俯拾皆是,其中不乏持批评意见者,如王世贞云“诗不能无疵,虽《三百篇》亦有之”,并举例指出《诗经》句法太拙、太直、太促、太累、太庸、太鄙、太粗的情况②;晚明锺惺等人以文学批点之法评骘《诗经》文本,清儒视作以诗法解《诗》,斥为“变圣经为小品”③;又有张国玺、刘一相、黄廷鹄等人,为建构更为完整的通代诗史谱系,径直将《诗经》篇目选入文学总集④,“以文论经”的风尚致使《诗经》向“诗”的回归。在此背景下,《诗》作为恒久至道、不刊鸿教的经典开始褪去神圣光环,走向文学化与大众化,而作为流行传注的朱《传》则成为明人删选实践的主要对象。

见存删选本均以朱《传》为底本,文本面貌与原书相差不大,仅在选诗和存注方面有所区别。诸本选诗情况见表 2:

---

①详参吴夏平:《试论中唐“六经皆文”观念的生成》,《文学遗产》2016 年第 6 期,第 56 页。

②王世贞撰,魏宏远点校:《艺苑卮言》卷一,陈广宏、侯荣川编校:《明人诗话要籍汇编》第 6 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2424—2425 页。

③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五,中华书局,1965 年,第 121 页。

④详参汪祚民:《〈诗经〉入选文学总集的历史考察》,《学术研究》2012 年第 10 期,第 129—138 页。

表 2

见存删选本	总选诗数	国风(160)	小雅(74)	大雅(31)	颂(40)
王甘棠辑《新刊三场备用诗经蠡测奇语》	267	123	74	31	39
俞指南辑《诗经注选》	133	52	41	23	17
冯廷章辑《诗经汇纂》	169	40	59	30	40
王国宾辑《诗经纂要》	139	58	40	21	20
题陈仁锡校阅《诗经疏义统宗》	268	130	69	31	38
余彰德刊《诗经三注粹抄》	233	105	64	30	34
余象斗刊《刻陈眉公先生诗经选注》	245	122	67	30	26
读书坊刊《诗经纂注》	160	70	43	24	23

由表 2 可知,诸删选本重《雅》《颂》而轻《国风》,二《雅》之中又特重《大雅》。进一步统计它们所选的具体篇目,可知诸书均选录之诗共 79 首,分布较为集中:《雅》《颂》凭借 52 首的数量成为绝对大宗,二《南》和《豳风》则以 14 首的入选量在《国风》中名列前茅;诸书均未选录之诗共 10 首,且均属于《国风》,包括:《丘中有麻》《葛兮》《褰裳》《丰》《东门之墠》《溱洧》《载驱》《羔裘》《东门之杨》《防有鹊巢》,其中有 8 首系朱子所定“淫诗”,剩余《载驱》《羔裘》二首,或因系刺诗,或因意旨不明而未入选。各本均选录之诗,意味着在明人观念中是最重要且最需学习的《诗经》篇目。

朱《传》为《诗经》文本重新赋予道德内涵和价值判断,归纳起来可分为“正向”和“负向”意义两大类:前者或颂圣君贤臣、或美民俗淳厚、或赞德行修养,凡事关国政王道,语用吉祥祝福;后者或为淫诗情诗,或为怨刺丧乱之诗,多囿于个人情绪。以此观之,各删选本所选篇目集中于《雅》《颂》《豳风》及二《南》等,主要为朱《传》中“正向”意义之诗,而这种取舍倾向实与明代科举考试密切相关。侯美珍通过统计明代 1577 道《诗经》义乡会试试题,整理出常见及罕见出题诗篇,并得出考试更青睐于选择吉祥颂美等类诗篇的结论,认为这是考官出于政治风险和政教风化的谨慎

考量①。上述删选本对各部类及具体诗篇的甄选,与侯氏总结的规律颇为契合。特别是10首未被任何选本择取的诗,均名列侯氏编制的“乡、会试《国风》未曾出题篇目”表②中。可见,作为面向广大学子的备考书籍,朱《传》删选本取舍诗篇的主要原则当为官方的出题偏重。

另一方面,诗篇的辞章性亦是需要纳入考量的重要因素。明正、嘉时期兴起的“以古文为时文”的创作主张,要求首场八股文的写作能巧妙化用经语和史事,达到融液经史的效果,这驱使士子去经史文献中寻章摘句,裁剪并融炼经典语句和历史掌故。而二、三场策论的撰写历来讲求引经据典、博采诸家,以全面展示应试者知识储备的广度。学子为塑造自身“博雅之士”的形象,往往依赖相关经史节本或类书以求速成。诸删选本作为面向市场的举业书籍,自当兼顾所选篇目的文学性和经典性,以满足士子的撰文需求。如汪文辉将经书视作科举作文的素材库,云“士生斯世,不通五经以应有司之求,是求材宝舍林谷川泽也”,并指出俞氏《诗经注选》系“选其精切者,辑而注之”③。王国宾明言其书专为举业文章服务,“摭其华要,苟利于举子业之文,则援笔采焉”,并强调此书非为“专而精之者”而编,而是为“兼而采之者”而设④。至于王甘棠所辑《新刊三场备用诗经蠡测奇语》(台湾汉学研究中心藏,索书号:308 07604),从书名即可看出其潜在读者为第三场应试学子。冯廷章《诗经汇纂》的服务范围更是从时文写作扩展到一般文章的写作,其云:“初学者翻读一过,可供采撷旁搜者,偶简数言,亦便参稽于文章家。”⑤可见,作为撰文资源库的删选本,上述“精切”“华要”等选摭标准,实指向诗篇章句的辞藻文翰方面,即要求诗句语言具有雅正、典实或华美等特点,以助力文章华彩出众,这是除基于道德、义理等出题原则之外的又一标准。

细查考试中罕见出题但又颇受选家青睐的相关篇目,能更直观地看出这一兼顾辞章的选篇倾向。结合侯氏研究,可统计出明代乡会试未曾

---

①侯美珍:《明代乡会试〈诗经〉义出题研究》,台湾学生书局,2014年,第93—170页。

②侯美珍:《明代乡会试〈诗经〉义出题研究》,第111—112页。

③汪文辉:《刻五经注选叙》,俞指南辑:《五经注选》卷首,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元年(1573)刊本(索书号:15528),叶一至二。

④王国宾辑:《新刊君子亭五经摘草》卷首自序,台湾汉学研究中心藏明万历十一年(1583)序刊本(索书号:109 01232),叶三。

⑤冯廷章辑:《绿斐堂五经汇纂》卷首自序,日本内阁文库藏吴门钱学周梓本(索书号:经030-0003),叶七。

出题但诸删选本均选录者共 11 篇:《汝坟》《简兮》《考槃》《衡门》《匪风》《破斧》《小弁》《巷伯》《蓼莪》《车舝》《荡》。考察发现,诸诗多为明人认为文学性较强的篇目,如除《汝坟》《破斧》外,其余均被《诗学正宗》《汇古菁华》《诗治》等包含《诗经》的明编诗歌总集之一种或多种选录;又如其中《汝坟》《简兮》等 6 诗之章句,曾为王世贞摘录并表彰,作为诗歌师法典范加以推崇①。诸篇虽因义理有亏或情含怨怼而被摒弃于科举体系之外,却凭诗歌艺术、文法修辞或情感抒发而被选家认可并选录。其中屡次入选的"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哀哀父母,生我劬劳""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等诗句,允称诗歌史上的隽永佳句,自是学子操觚之养料。可见,科举作为"指挥棒"虽圈定了篇目取舍的大范围,但具体选诗情况又与教习阶段、选家个人眼光有关,而辞章更为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标准。当然,除不录考试鲜及与文辞平平者外,重章叠句之类的复沓之语亦多被删去,兹不详述。

在明代科考实践中,朱《传》因其理学标准和阐释体系的先天限制,致被删选。而在"重文"的风尚下,作为经书注解的朱《传》表现出文学化选本的趋向。其中一些删选本打散原书,热衷于寻章摘句,从而具有类书的特征,则与朱《传》原貌相去甚远。然此类选本裨益制艺,亦具有基础文学教育的功能,同时也进一步促进着《诗经》篇目、章句的文学经典化。

三、增注本:朱子《诗》学的扩容与突破

经学传注文献的生成本身具有摭拾条目、荟萃成书的特点,而增注本即为采辑或自撰条目对朱《传》注文进行增补的衍生著作。部分增注本虽对朱《传》本身亦有略微删减,但其增补的内容更为重要,颇能折射出当时的学术习尚。以《诗传大全》为代表的增注本在明代自成系统,游离于官学体系之外的其他增注本则更具活力,它们或补益修正,或商榷辩证,共同促成朱子《诗》学的内在延展与转折,并推动一个内涵丰富、真伪混杂的《诗》学体系最终形成。

(一)《诗传大全》系列

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和经学权威的集中体现,《四书五经性理大全》曾

①王世贞撰,魏宏远点校:《艺苑卮言》卷二,陈广宏、侯荣川编校:《明人诗话要籍汇编》第 6 册,第 2428—2433 页。

长期作为统摄明代学术与教习的主要思想框架。《诗传大全》(下称《大全》)作为这一官方文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亦体现出全面倒向程朱理学体系的学术取向。其《凡例》开宗明义,直言“一以朱子《集传》为主”①,同时又网罗众说,最终发展成明代朱《传》增注本系统的一大干流。《大全》直接底本为元人刘瑾的《诗传通释》②,刘氏之书严守朱《传》,又以二十卷本为蓝本,故承袭它而来的《大全》自然可视为朱《传》之衍生著作。以永乐内府本《大全》为例,全书经文以大字顶格写刻,朱《传》字略小且降一格刻写,又采用双行小字的形式于朱注之下纂集诸家之说,形成经、注、疏三级结构分明的纂疏体著作,具有注注而非注经的强烈倾向,同时附刻《诗传大全图》《诗序辨说》等文本,以丰富朱子原书的内容。据杨晋龙统计,是书于朱《传》外增引 98 位先儒(包括朱子)的 4830 条论说,60 种典籍的 404 条注解,以及 718 条对字义、音义和地名的增补或修正③。宋元诸儒在征引名单中占绝对大宗,且多为朱子后学,而主要采摭对象《诗传通释》《诗集传音释》《诗经解颐》等书亦为发明朱《传》之作。可见,《大全》凭借政治力量推崇朱《传》,进一步巩固其官学地位,极大地增扩了其文本内容,并首次实现宋元以来朱学系统《诗》学知识的全面绾合。

《大全》系列于永乐十三年(1415)纂修完成,并在两年后敕令颁布学宫。作为羽翼朱《传》的集大成之作,它完成了朱子《诗》学谱系的建构,但亦桎梏着朱《传》的进一步阐发。明初尚有《诗演义》等专主朱《传》的学术著作,而类似书籍在《大全》颁刊之后甚为少见,取而代之的是官方和民间层出不穷的《大全》重刊本或改造本,这意味着它正式步入低质化的复制阶段。《大全》在明代至少有 25 种版本④,其中各类坊刊本颇具特

---

①胡广等纂修:《诗传大全》卷首《凡例》,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永乐十三年(1415)内府刊本(索书号:T/434/4208),叶一。

②但与《诗传通释》相比,《大全》亦有回归朱《传》的倾向,如将刘氏书中与朱子矛盾者删汰,又将隶于各篇之下的《小序》依朱子之旧重新合成一编。

③杨晋龙:《〈诗传大全〉来源问题探究》,林庆彰、蒋秋华主编:《明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研院”文哲所,1996 年,第 334—336 页。

④关于《大全》的明刊本,杨晋龙统计为 18 种(杨晋龙:《明代诗经学研究》,第 223—224 页),王赫统计有 11 种(王赫:《从〈四书大全〉的刊刻看明代经学、科举、出版与社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九十四本(2023 年)第一分,第 258—259 页),去重合得 25 种。

色。如成化元年(1465)庐陵罗氏勤有堂刊本系现存较早的民间刻本,该书写刻质量并不高,主要变化是将所引诸儒姓氏用括号圈出以更加醒目。崇祯年间诗瘦阁重刻本除小注中引用姓氏、音释亦用方框圈出外,与内府本相比,每半叶少两行,每行少一字,更加疏阔清晰。此外,万历间建阳书林余氏所刊《叶太史参补古今大方诗经大全》盛行于晚明,是书托名叶向高、张以诚等时贤名公,除在书名、卷数及行格等方面与内府本相异外,其他内容基本一致。但余氏亦有不少便于阅读的细节改造,如将字号增大,将诸儒姓氏用方框圈出,又将经文之下的音释改为旁注形式。值得注意的是,是书上栏存有空白眉评框,有研究者指出此系集评被删除或未落实刊刻所致①,可见余氏或有进一步增扩《大全》的意图。

如果说上述诸本对于《大全》的翻刻与改编尚属局部微调,那么明末张溥所辑《诗经注疏大全合纂》则是在思想内容上真正有所突破。张氏以昌明朱子《诗》学为编纂宗旨,但他使用的方法却是兼采汉唐古注疏:"今同(《大全》)次列,使学者于《诗》首先观《序》,而后《辨说》,于本诗先观《传》《笺》《疏》,而后《集传》及诸儒。则古今异同,汉宋曲直,亦过半矣。"②全书在删节本《大全》的基本架构内添入其他内容,如卷首大体删节自《大全》,但同时又增加孔颖达《毛诗正义序》和郑玄《诗谱序》;正文解《诗》先节录《毛诗正义》,再节录《大全》文本。前述增注本或是于《诗经》宋学序列中采撷条目辅翼朱《传》,或是仅做形式方面的微调,并无本质突破,而张氏此书则大肆加入汉唐《诗》说,表现出兼采汉宋的鲜明学术取向,实为《大全》衍生过程中的一大新变。

(二)其他增注本

《大全》系统的文本增补或改纂,大多属于《诗经》宋学内部的扩展与整合。而游离于官学体系之外的其他著作,则不断突破朱学边界,这种对朱《传》的分化与瓦解至晚明达到顶峰。诸书以朱《传》原书或删节本为基础文本框架,广泛采掇历代《诗》解,增加了数量可观的新注条目,代表性著作引书情况如下:

---

①王赫:《从〈四书大全〉的刊刻看明代经学、科举、出版与社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九十四本(2023年)第一分,第233—235页。

②张溥纂:《诗经注疏大全合纂》卷首自序,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崇祯刊本(索书号:T/434/1334),叶七。

1. 陈深《毛诗解诂》：于篇首增《子贡诗传》《子夏诗序》。

2. 凌濛初《诗逆》：于篇末大量引用徐光启《毛诗六帖讲意》、陆化熙《诗通》、魏浣初《诗经脉》、沈守正《诗经说通》、锺惺《诗经评点》、唐汝谔《毛诗微言》、徐常吉《毛诗翼说》七家语，并间出己意。

3. 顾梦麟《诗经说约》：于朱注后增加毛《传》、郑《笺》、陆德明《释文》、孔《疏》、欧阳修《诗本义》、苏辙《诗集传》、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朱子语类》、严粲《诗缉》、朱公迁等《诗经疏义》、胡广等《诗传大全》、黄佐《诗经通解》、沈万钶《诗经类考》、沈守正《诗经说通》、徐光启《毛诗六帖讲意》、何楷《诗经世本古义》、陆南阳《诗经讲意》等十数家言论，并出本人按语。

4. 朱日濬《朱氏训蒙诗门》：于朱注后旁征《小序》、毛《传》、《尔雅》、《释名》、郑《笺》、陆德明《释文》、孔《疏》、欧阳修《诗本义》、苏辙《诗集传》、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朱子语类》、严粲《诗缉》、王应麟《困学纪诗》、朱公迁等《诗经疏义》、胡广等《诗传大全》、黄佐《诗经通解》、丰坊《鲁诗世学》、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顾起元《尔雅堂家藏诗说》、沈万钶《诗经类考》、沈守正《诗经说通》、徐光启《毛诗六帖讲意》、顾梦麟《诗经说约》、卓去病《国风说》、邹肇敏《诗传阐》、范王孙《诗志》、何楷《诗经世本古义》、陆南阳《诗经讲意》、朱柱之《诗原》等，并出本人按语。其所引《发微》《蠡测》《诗所》三书今已不可见，撰者难考。

此外，又有两类增注本较为特殊。一是层累增注型著作，与上述诸作相比，其编纂者不止一人，且跨越不同时代，其文本也具有层层叠加的特征。如元人朱公迁疏解朱《传》的作品《诗经疏义》，完成于至正七年（1347），其后明人王逢又广录诸家以充实朱氏“疏义”，于永乐十五年（1417）完成该书“辑录”部分，王氏门人何英进一步开展补遗工作，并于正统九年（1444）完成该书“增释”部分（王、何二人所增注文主要采自《大全》）。至此，包含三人注疏成果的文本面貌最终形成。朱公迁于朱注之后增加疏解文字，王、何二人又于其疏解后增附大量条目，这种长期、多次的增注行为，目的是希望能充分详尽地阐发朱《传》。二是原创性较高的评点类著作，如锺惺批点本《诗经》在晚明风行一时，锺氏自云此书“大抵依考亭所注，稍为之导其滞、醒其痴、补其疏、省其累、奥其肤、径其迂”①，

①锺惺批点：《诗经》卷首《诗论》，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明泰昌元年（1620）三色套印本（索书号：rb1412），叶四。

可见其依傍朱《传》但又有所辩证的宗旨。今见日本内阁文库藏有杞堂本①,即以简本朱《传》为蓝本,增刻大量锺评条目,但众多条目已溢出朱子思想体系,且文学色彩较为浓厚。锺氏评点风格闲杂自由,他倡言不泥于朱《传》的质疑精神,常以朱子言论为柄的,具有对话朱《传》的显著特征,实可视为一种特殊的增注本。

上述著作虽多强调朱子的官方正统地位,但实已不再谨守朱《传》,文本内容亦不断扩容,如《朱氏训蒙诗门》所引他著达30余种,形成36卷体量的经部大典,远远超过朱子原书。由以上引书统计可知,与明前期占主流的《大全》系统相比,晚明增注本的选材范围和收录特点已有明显变化:

一是从摘录前人旧籍到采摭明人新著。本朝学者的《诗》解、《诗》论开始取代先儒旧论并占据主流,注文选择亦体现出时代转向,其中黄佐、徐光启、何楷等人的著作最受青睐,如凌濛初《诗逆》所引七书均为明人著作,可见其追逐时风的倾向。

二是从朱学拓展到其他《诗》学系统。衍生本对汉唐《诗》学知识和偏重名物考证类著作的征引,在"汉学复苏"的晚明已不足为奇。而丰坊等伪造的《鲁诗》学系列著作亦被广泛引用,作为时新元素被纳入朱《传》的文本体系内,如《毛诗解诂》大量引用《子贡诗传》、《朱氏训蒙诗门》引用《鲁诗世学》《诗传阐》等均是体现。

三是从以学术著作为主到兼重举业本。上述著作多为服务于科举教习而编撰,故其所引除较为典正的学术书籍外,亦不乏流行于坊间书肆的制举书,如被较多采撷的《诗经脉》《诗经讲意》《诗经说通》等均属科举讲章之类。

四是从专重经学到兼顾文学。上列黄佐、锺惺、徐光启等人的作品,历来被视为明人以文学解《诗》的型范,其《诗》著常包含后世诗句、字词赏析及情感分析等内容,《诗逆》《朱氏训蒙诗门》等衍生本对这类著作的集中引用,体现出它们对辞章的兴趣。

朱《传》在明代的增注情况及其嬗变过程,固然可以体现当时崇尚博杂的学术风气,但亦反映出传统《诗》学内部的发展规律。相比于嘉靖以

①锺惺评点:《诗经》,日本内阁文库藏明泰昌元年(1620)序刊本(索书号:273-0200)。

前主要以宋元文献为材料来源的作品,万历以后的增注本则兼收前代遗产与明人新说,当代《诗》学知识的再生产现象引人注目,这更多地反映了明人在朱子《诗》学脉络演进中所做的贡献。一些广采博收的增注本,不仅具有保存明代《诗》著的文献价值,其自撰按语亦颇具学术价值。如《诗经说约》在明末清初极为流行,吴周瑾指出"是书亦举子兔园册也,然于经义颇有发明"①,即肯定其经学价值。又如《朱氏训蒙诗门》虽系入门之书,部分条目甚至袭自《诗经说约》,但朱日濬以朱子后裔自居,常于自撰按语中寄寓学术追求,如他通过音韵考证指出坊本将"雎鸠"之"雎"直注为"疽"所存在的问题,这比乾隆间史荣、纪昀《风雅遗音》的质疑早了一百多年②。

四、拼合本:朱《传》文本的二次改造

拼合本系将朱《传》或其各种变体视为整体,再与其他经说文本组合而成。又因分栏编刊方法的普遍运用,故其主要呈现出多截版的文献面貌,是一种典型的"高头讲章"。多数拼合本对朱《传》进行二次改造并制作成新著,而上述部分初次衍生著作则构成了拼合本的基础文本来源,朱《传》的文献衍生链条得以进一步延长。拼合本欲于有限的书版尺幅内提供更为丰赡的《诗》学知识,故将教材、讲章、工具书等功能各异的教学材料合为一体,以满足学子的多重需求。一些拼合本的流行甚至取代了原书,在保存《诗》学文献方面具有一定意义。

(一)原本、删节本《诗集传》等的拼合

将朱《传》原本与其他文本材料组合,乃明代拼合本较为普遍的类型。今见拼合本中朱《传》原文均位于下栏,且据卷次、音释等特征可知均属八卷本系统。除《诗经金丹》增添"小题秘旨""难题秘旨"等少量考题技巧指导文字③外,其余著作下栏均为单一的朱《传》文本。诸书其他

---

①转引自朱彝尊撰,林庆彰等主编:《经义考新校》卷一一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70页。

②《风雅遗音》对"雎"等字音的质疑与考辨,以及关于此书学术价值的评析,详参朱杰人:《论八卷本〈诗集传〉非朱子原帙兼论〈诗集传〉之版本——与左松超先生商榷》,《中华文史论丛》第五十七辑,第218—226页。

③题顾起元:《新刻顾邻初太史朱批诗经金丹》卷一,日本内阁文库藏明版筑居刊本(索书号:273-0244),叶三。

栏目详情见表3：

表3

编刊者及书名	上栏	中栏
杨国会编《新锲晋云江先生诗经阐蒙衍义集注》	江环《诗经衍义》	前人《诗》说条目
杨国会编《重订晋云江先生诗经阐蒙衍义集注》	江环《诗经衍义》	无
周鸣岐刊《魏太史朱订秘笥诗经讲意纲目集注》	徐奋鹏《诗经讲意纲目》	无
张运晋订《新镌黄维章先生诗经娜嬛集注》	黄文焕《诗经娜嬛》	无
张利忠编《新刻翰林真传举业全旨讲意诗经发微集注》	王应选《诗经发微》	“分解主意并提释注意”
版筑居梓《新刻顾邻初太史朱批诗经金丹》	顾起元《诗经金丹》	无
周文耀梓《琴涧居朱订诗经心诀》	何大伦《诗经心诀》	补充资料、读诗心得

据表3，与朱《传》原本拼合的上、中栏内容均为现成的《诗》学文本，且多为盛行一时的科举讲章，如表中《诗经衍义》《诗经讲意纲目》《诗经娜嬛》等全为分章串讲、疏通经文大意的讲义著作，而其所题撰者亦不乏托名情况。此外，多数著作又于卷首嵌入大量基础的《诗经》资料汇编，如《诗经金丹》卷首收有“毛诗正变指南图”“诗经金丹汇考”“诗经难字”“四书引诗字韵异同辨”等文本，将《诗经》图、《诗经》所涉难字、名物典故、主要概念、传授谱系等《诗》学常识尽悉归纳整理，于初学者而言极为便利。

各类删削本朱《传》在明代颇为流行，以之为中心又衍生出新的拼合本，主要有四种类型：

一是一般删注本与其他文本的拼合。如题张元芳、魏浣初撰的《毛诗振雅》一书，其中栏的朱《传》文本为全书主体，但大肆删削注文，仅保留诗柄、注音及“赋比兴”标识，篇末又录有锺惺批点《诗经》的条目。与之拼合的文本，上栏是典型的科举讲章，下窄栏为锺惺批语。又有顾懋樊所撰的《桂林诗正》，下栏主体亦为删注本朱《传》，主要留存诗柄部分，与

之组合的上栏是“诸儒诗解钩玄”,专摘前人《诗》论作为补充。

二是白文本、准白文本的拼合。以金陵王荆岑所刊《新镌笔洞山房批点诗经捷渡大文》为例观之,其下栏仅有少量朱笔批语及圈点,可视为一种准白文本,检其篇什与分章,知其底本为朱《传》;书版上栏由若干条目构成,内容主要是章节概括或字词评赏。

三是旁训本的拼合。如白炤山房所刊题陈子龙订定的《诗经训解》,此书前附朱子序文,正文下栏系一种“诗经旁训”,校其文本可知接近八卷本系统,但与前揭各旁训本又有细微差别,当是经过坊间的再次改易,与之一一对应的是上栏的讲义文字。

四是删选本的拼合。由刘孔敦梓行的《项仲昭先生纂注诗经奇英》,下栏是一种选篇、选句的删选本朱《传》,所存朱注亦较简略,与前述《诗经三注粹抄》的文本面貌颇为相似;其上栏偏窄,内容闲杂,兼有偏学术性和偏文学性的条目,颇具评点意味。此外,国家图书馆所藏题叶向高纂的《新锲尊朱诗经讲义举业便读》(索书号:T01942),全书分为四栏,最上层“录破”专录诗篇、诗章或诗句之破题,次层“讲旨”分章串讲旨意,第三层“摘旨”广引前人《诗》说,最下一层系八卷本朱《传》,并以旁训形式增加注解,是书的形式特征较为罕见,且同时具有拼合本、旁训本和增注本等多重性质,极具特色。

(二)讲章化《诗集传》的拼合

讲章(或云讲义)是一种普遍应用于教学实践的经典阐释体式。四库馆臣对科举讲章类《诗》学著作批驳甚多,如论《诗经脉》云:“惟大致拘文牵义,钩剔字句,摹仿语气,不脱时文之习。”①评《诗经集成》云:“故首列朱子《集传》,次敷衍语气为串讲,串讲之后为总解,全如坊本高头讲章。”②虽为贬损之调,但亦道出讲章体循文衍义、分章串讲及揣摩语气等主要特征。而所谓的“讲章化《诗集传》”,即保留朱《传》主要元素和基本样貌,敷衍朱子注解并连缀成文,依次附于对应章句之后,致力于经传的串讲与贯通。

以徐奋鹏《诗经解注》(简称《解注》)为例观之,是书又名《诗经删补》,系徐氏课儿讲义,因简便易记曾在小范围抄录流传,后被书贾梓行,

①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七,第141页。

②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十八,第145页。

又伪托馆阁名公①,遂漫流海内,影响甚大。《解注》以朱《传》为本,秉承疏脉理、畅论说的宗旨展开删补工作,表现出明显的讲章化倾向。顾梦麟曾指出朱《传》解经方式之“创例”:“小注释物,总注说大意。释物准训诂,说大意处仿佛口齿,则已滥觞比偶,衍长即得也。”②其“总注”串讲大意和代言揣摩的特点,已开讲章之滥觞。徐氏继承并发挥朱子解《诗》传统,重“大意”而反对“割裂”“琐碎”,故大幅删减“小注”中字词训诂,整合并连缀“总注”中诗柄及章意概括部分,使零散的注解文字更具连贯性。如《静女》第二章,朱《传》并未做专门的章意概括,徐氏先将原书长达44字的训释简化为“赋也。娈,好。彤,赤也”7字,又据朱注揣摩语气,代诗人之口敷衍出完整的章意:“及相会则贻我彤管,以结殷勤之意,而此彤管炜然,其赤已见可美,然我既得此物,又深悦此女之美也。”③此外,徐氏常于篇末诗题之后增附章节大意的概括与串讲,进一步分析全篇结构和前后关联。如朱《传》于《汝坟》篇末并无任何阐发文字,《解注》则增补串讲语句,云:“首追言未归之忧,次自叙既归之喜,末则慰以感恩而忘劳之义,此见妇人之贤,而亦文王之化所感也。”④如此改造,使得朱《传》串讲、疏通经文的功能更为凸显,而训诂色彩则不断弱化。徐氏贯通经传脉络的意图十分明显,最终目的则是方便学子据此敷衍出上下比偶的制义文章。

徐氏此书在明清时期影响甚大,其文本被大量搬运袭用,又与其他材料拼合,由此实现朱《传》的再次改造。今见至少有以下四种拼合本与之相关:万历四十四年(1616)詹氏静观室所刊《新刻诗经铎振》,下栏题“笔峒徐奋鹏删补”,上栏与之合编的文本是江环的《诗经衍义》;天禄阁重刻的《采辑名家批评诗经删补》下栏为徐氏原书,上栏则以锺惺批点《诗经》的条目为主;顺治十五年(1658)归起先所刊《诗经通解》,下栏亦为徐氏书,上栏则组合以陆化熙《诗通》文本;另有一种题张居正的《诗经直解》,

---

①徐奋鹏:《徐笔峒先生十二部文集》卷八《内讼》,国家图书馆藏明金陵光启堂王荆岑刻本(索书号:18086),叶三十五至三十六。

②顾梦麟:《诗经说约序》,顾梦麟纂述,杨彝参订:《诗经说约》,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明藏崇祯十五年(1642)序刊本(索书号:T/434/3840),叶二。

③徐奋鹏辑:《诗经解注》卷一,天津图书馆藏清顺治十五年(1658)归起先刊《诗经通解》本(索书号:S6668),叶三十一。

④徐奋鹏辑:《诗经解注》卷一,叶八。

由书林詹伯祯梓行,下栏题“博古斋遵注诗经直解指南汇编”,其“直解”及篇末又有袭用徐氏书处,上栏则包含顾梦麟《诗经说约》、锺惺“总批”等文本。当然,亦不乏独立于徐书系统之外的拼合本,如题杨廷麟《朱订诗经揆一宗旨》的下栏“诗经翼注”,亦是一种讲章化的朱《传》,但注文与《解注》并不相同,其上栏则袭自凌濛初的《言诗翼》。

徐氏《解注》虽追求讲章的语脉贯通,但依然保留朱《传》形貌和少量训诂,如果说它是介于传注和讲章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那么晚明另外几种拼合本的改造则更为彻底,朱《传》文本基本已被打散、稀释,如跃剑山房所刊《新刻大小冯先生手授诗经》、熊氏种德堂所刊《新刻金陵原板诗经开心正解》及题黄道周编著的《新刻黄石斋先生诗经琅玕》等书,其上栏多系讲章文字或字词训释,下栏均是各种讲章化的《诗集传》,它们致力于个性化译读、融通朱注,除保留经文和少量注文外,与典型的《诗经》科举讲章已区别不大。

五、从宋到明:朱《传》衍变的学术意义

由上文所述“删节本”“删选本”与“增注本”“拼合本”可知,朱《传》文本内容在明代的变化主要为删削、增补两种形式,而增删之间实折射出朱子《诗》学的嬗变情况和明代社会文化的新动向。一方面,明代删削本对于朱注的删汰可归纳为三种主要类型:一是删去繁琐的字词训释,特别是具有考据色彩的文字,如朱子训“雎鸠”时引用《毛传》《列女传》的文字常被减省;二是删去拓展引申的资料,通常为篇末的史料征引,如《关雎》题下所引孔子、匡衡等大段言论常被略去;三是删去阙疑或模糊性的论断,多为朱子的学术猜想或未定推测,如《卷耳》题下云:“岂当文王朝会征伐之时,羑里拘幽之日而作欤?然不可考矣。”①类似注文通常不会留存。而对于篇目和章句的删减,则与章句重复、出题倾向和文学性等相关。可见,经过一系列删减操作,朱《传》在明代已具有去学术化和简单化的倾向,目的是使理解难度降低,便于阅读和应试,从而让学习备考更具针对性。

另一方面,明代增补本在以朱《传》为代表的《诗经》宋学体系中,所增主要包括汉唐《诗》学、伪《鲁诗》学、科举教习和文学性等方面的内容。从经学内部发展的规律来看,出于对程朱理学长期统治的一种叛离,朱子《诗》学体系得以不断开放,这反映出明代经学发展从一统到多元的趋

①朱熹集撰,赵长征点校:《诗集传》卷一,第6页。

势。特别是作为一股“执拗的低音”的《诗经》汉学,以及崛起于明中期而颇具“异端”气质的伪《鲁诗》学体系,最终汇入晚明朱《传》的衍生著作中,完成了几大《诗》学系统的融通与汇流。但需要注意的是,除个别增注本外,其他著作的学术性并不强,大多仅为初级的引文罗列和材料拼合,缺乏进一步的考证思辨或义理阐发,这是由于它们本为举业而辑,目的是汇集诸说以供学子参考、采掇,艰深的学术考辨和抽象的思想理论无益于日常学习,故不必过分苛责其学术水平。已有研究指出,晚明应试者具有求新求异的多样化知识需求,他们不断突破程朱藩篱甚而杂收佛道诸子之学①,故采摘朱《传》以外的注文作为新的撰文资源并不鲜见。而增补本所涉关于字词章句解析、八股文法指导的条目,以及大量拼合的《诗经》科举讲章、参考资料集成等文本,则更为直接地指明了其举业之用。总之,我们于增补本中可以发现朱《传》经义多元化、功能举业化及阐释辞章化的相关特征。

此外,出版业在朱《传》文献流衍过程中亦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宋代逐步发展起来的商业出版于明代大放异彩,特别是晚明异常活跃的书籍出版领域,书商在新技术的支持下,凭借一系列的编刊方式和营销手段,生产出各类面向举业市场的《诗经》教习用书。朱《传》作为一种可塑的公共编书素材,坊间针对不同的阅读需求,大肆重刊翻新、删削增广其文本内容,又在其二次、三次衍生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拼贴糅合、抄撮变换,不断生产新著,如其衍生著作《诗传大全》《诗经解注》《诗经说约》等,已然成为坊间流行的新素材来源,这均使得朱《传》衍生文献的面貌更为复杂,衍生链亦不断延长。书坊对朱《传》的实用化改编,不仅体现在对旁训体等新兴解经体式的推崇与传播上,还体现在竭力周全读者,对字体字号、书版格式等作出调整,如多截版的运用即能含括更为丰赡的《诗》学知识,对于学子备考不无裨益。一些衍生著作甚至还出现朱评本、多色套印本、巾箱本等精美样式,具有娱人眼目或便于携带的特点,极大地丰富着朱《传》的书籍形态。然而,晚明出版行业的无序竞争和肆意袭用,导致朱《传》衍生著作的市场层级日趋下移,出现大量低质化、同质化的问题,这也是它们被后世诟病的重要原因。

---

①参见陈维昭:《隆庆戊辰会试与晚明文风士习》,《文艺研究》2019 年第 11 期,第 55—63 页;王涵:《明末清初“诸子入八股”考论》,《文学遗产》2022 年第 4 期,第 145—156 页。

上文关于朱《传》衍生著作众多特征的揭橥,实指向明代经学普及化、教习化的特质,“删”的目的是取便初学,“增”是为了拓展知识含量,形式变换亦旨在便利读者,无一不是为科举制度下广大学《诗》阶层服务。可见,以朱《传》衍生文献群为载体,通过一系列实用化的举措,明人成功打造出一套内容和形式相配套、从低阶到高阶均囊括的完整学《诗》体系,诸书成为明清以来《诗经》教习用书中的大宗,朱《传》亦成为明代《诗》学研习最坚实的底色,从科举教习的维度将明代定为“述朱”时代是毫不为过的。

但明代并非是以《诗》学创造著称的时代,而是一个普遍学《诗》的时代,其《诗经》研习具有从穷经致圣转向日用教习、从神圣向庸常回落的整体特征。朱《传》沦为举业弋获之用,其学术方面的深耕与开拓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历史地看,南宋作为朱子《诗》学形成时期,朱《传》于疑经变古的学术氛围中诞生,通过与各学派反复的辩难和交融,凭借其创新性和体系性之优势,经由门人弟子的辅翼与传播,最终在宋代一众学术著作中脱颖而出;元代则是朱《传》多元发展的时期:胡一桂、刘瑾、朱公迁等人撰书进一步赓续其学术思想,延祐年间确定其官学地位,后期服务于科举的衍生文献也开始出现;经元之过渡,明代朱子《诗》学由于进一步的制度化规约和普及化推广,其学术研究因《大全》的全面整合而逐步僵化、停滞,其义理又因衍生本的肆意篡改而流于支离琐碎。但这一朱《传》哲学光辉退场和思想活力丧失的时期,又恰恰是它被最为广泛地阅读与使用的阶段。可见,朱子《诗》学从一种创造性的思想体系,逐步被官方接受,又通过政治权力和基础教育推广开来,最终在明代全面走向普及化,并逐步渗入到中下层知识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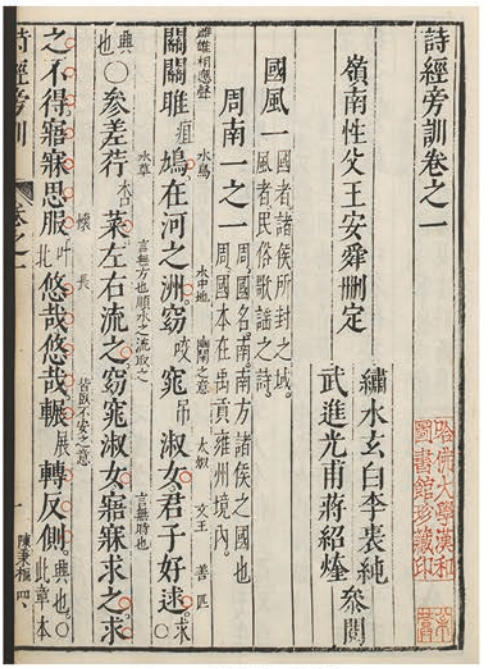
朱《传》由精英《诗》学著作到成为大规模流通的民间学《诗》读本,这一衍变过程反映出宋、明两代不同的社会文化特征:即宋代是创造与开启的时代,明代是学习与使用的时代。这启发我们从“宋明连续”①的长时段角度来思考近世《诗》学的内在理路,从而拓展相关研究的视野与边界。“唐宋变革”模型已揭示出汉唐与宋代经学的区别和分野,“宋明连续”则更关注同一学术体系下精英性与大众性的关系,关注从先锋学术见识到一般《诗》学知识的衍变过程,即不仅要研究“创造性”的宋代是如

①参见葛兆光:《“唐宋”抑或“宋明”——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视域变化的意义》,《历史研究》2004 年第 1 期,第 18—32 页。

何发明与创生的,也应重视“常识性”的明代是如何承用与改造的。具体来看,朱子别具一格的篇什章句划分、诗柄概括及“赋比兴”标识等,在晚明坊间衍生文献中已然凝定、普及成无需赘言的常识;他提出的“淫诗说”等在当时颇具特识性和争议性的理论主张,在明代科考实践中则通过回避或淡化的方式,作为对这一“棘手”问题的妥协性回应;又如他关于《国风》“里巷歌谣”的体认,已然内化成明人日用而不知的文学知识。而除朱《传》之外,其他宋人《诗》著亦不乏相似“经历”,如宋末著名的《诗经》研究者王应麟,晚明书贾胡文焕抽取其《玉海》卷三八《艺文·诗》部分更名为《玉海纪诗》,抽取其《困学纪闻》卷三《诗》部分更名为《困学纪诗》,并与王氏“三家诗”研究著作《诗考》和《诗经》地理学研究著作《诗地理考》,一同汇编进《格致丛书》,后又经书坊拥万堂剜版、托名等商业化改造而编入《古名儒毛诗解》,成为晚明颇为流行的学《诗》参考书。诸如此类,从高昂的学术理想到平庸的现实世界,从醇雅正大的经传典范到通俗浅近的兔园册子,相关著作的传播和衍生过程及其背后的制度、教育等不同时代的历史语境,均需得到进一步的梳理与阐发。

以往关于近世《诗》学尤其是明代《诗》学的研究,已然形成层累性的遮蔽:精英学术话语对下层《诗》学视角的遮蔽,系统性、原创性的理论追求对《诗》学实用价值的遮蔽,权威严肃文献的崇拜对坊间普及性《诗》学读本的遮蔽,正统经学立场对功利性、异质性《诗》学思维的遮蔽,单一经学路径对《诗》学多样性的遮蔽。这均导致以朱《传》衍生本为代表的众多教习类著作在历史时期盛行,但却缺席于精英学术史。故本文尝试跳出传统的经学史叙事主线,注重考察朱《传》普及化、大众化的一面,而非其“新锐”“特识”的一面。从正统学术史和文献史的角度来看,朱《传》在明代的衍生著作总体上是低质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影响力的保持也正是来自于相关衍生著作的不断回应与承续。文献之流衍和书籍之改造,在此成为我们借以窥测经学思想、举业风习变迁轨迹的重要视角。朱《传》在明代化身万千、无远弗届,其广泛刊印与方便易得又促成相关《诗》学知识的大量累积与传布,这势必引起时代思想文化的转变与调整,对于明代经学、文学和一般读书世界均会产生影响。而这些具体影响,也将成为我们未来推进相关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

【作者简介】周荣,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詩經旁訓卷之一

嶺南性父王安舜刪定

繡水玄白李裘純

武進光甫蔣紹煃 參閱

國風一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風者民俗歌謠之詩。

周南一之一 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貢雍州境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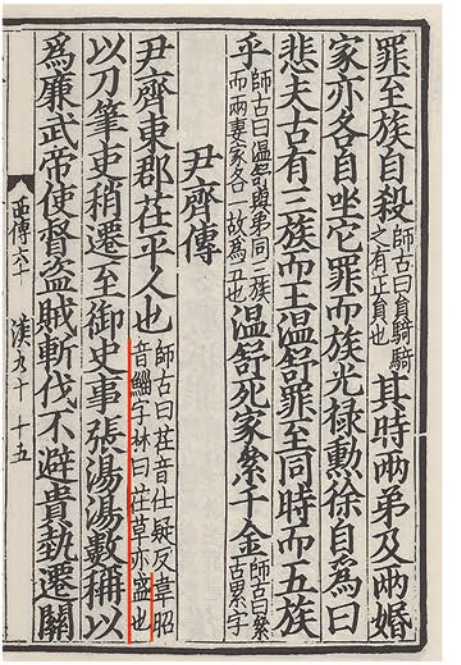
關關雎 疽 鳩在河之洲窈 咬 窕 吊 淑女君子好逑。求 ○

興也 ○參差荇 杏 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

之不得寤寐思服 懷 長 叶 北 悠哉悠哉輾 展 轉反側。興也。○此章本

詩經旁訓 卷之一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罪至族自殺 師古曰負騎騎之有正負也 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爲曰悲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 師古曰溫舒與弟同三族而兩妻家各一故爲五也 溫舒死家絫千金 師古曰絫古累字

尹齊傳

尹齊東郡茌平人也 師古曰茌音仕疑反韋昭音緇字林曰茌草亦盛也 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數稱以爲廉武帝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埶遷關

西傳六十 漢九十 十五

图1 《诗经旁训》

详参周荣文

图2 蔡琪本《汉书》

详参陆骏元文

图3 《万国来朝》

详参程梦稷文